



蒙古史学史



十三世纪——十七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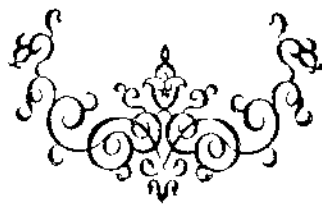
〔蒙古〕沙·比拉 著
陈弘法 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史学史



沙·比拉〔蒙古〕

著

陈弘法

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史学史
(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
〔蒙古〕沙·比拉 著
陈弘法 译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锡林郭勒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7—5311—0396—6/K·9 定价：2.10元

Шагдарыи Бира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8

内 容 介 绍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一书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博士、科学院通讯院士沙·比拉的重要史学专著，也是近年来国外蒙古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这部专著从史学史角度对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末蒙古封建主义制度确立时期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发展状况、十五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蒙古封建主义制度发展时期和封建割据时代蒙古人的史学传统进行了探讨。作者所探讨的历史作品和史学家有：《蒙古秘史》，《白史》，《圣武亲征录》，《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固什·却尔济和萨迦·瑞珠卜，佚名氏的《黄金史纲》，《甘珠尔经》蒙古文译本的各卷后记，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纲》，《大黄史》，萨刚彻辰的《蒙古源流》，《阿萨拉格齐史》等。与此同时，作者还对上述作品的成书年代、版本情况进行必要的考证，对史实材料进行必要的订正，对史学家的生平创作和作品的思想倾向进行必要的评价。由于作者广泛引用了蒙古文、英文、俄文特别是藏文中有关蒙古史的资料，故本书又具有较高的史料学价值。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由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领衔主编，由苏联著名蒙古学家兹拉特金任责任编辑，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本书可供蒙古史和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师生参考使用，也可供对蒙古史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出版说明

史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如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历史研究方法的演变情况，史学派别的斗争沿革，等等。我国目前有关一般史学史的论著尚不多见，专论蒙古民族史学史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为了适应蒙古历史研究的需要，我们翻译出版了这部《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供专治蒙古史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师生参考。对于蒙古历史以及蒙古文学、蒙古哲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书也颇有阅读价值。

本书作者沙格达尔·比拉（1927——）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留苏学习，并在苏联先后获得历史学副博士（1960年）和博士（1972年）学位。七十年代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担任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该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从五十年代末期起，比拉开始专门研究蒙古史学史，我们翻译出版的这部书便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内容系统，论述严密，含有丰富的史料学和史学史材料，是到目前为止国外研究蒙古史学史的第一部大型著作。该书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由苏联著名历史学家И·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的作者）任责任编辑，于一九七八年在莫斯科出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所致，书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这一点，请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在阅读参考时注意。

翻译出版蒙古史方面的书籍，难度很大。史实的查考，译名的确定，资料的参证，都很费功夫。尽管译者本人做了很大努

力，但是谬误之处实属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历史研究所留金锁、乔吉同志的帮助。译稿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余大钧同志审校过。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谢意。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 蒙古古代与封建主义确立时期的 历史知识（十四世纪末之前）	12
第一章 蒙古史学史的开端	12
第一节 蒙古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产生的前提	12
第二节 《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 ——蒙古史学史上的第一部巨著	31
第二章 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 十四世纪）	67
第一节 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历史编纂活动	67
第二节 《圣武亲征录》——一部蒙古历史著作	88
第三节 从汉文和波斯文史籍看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92
第二部 封建主义发展时期和封建割据时期的 蒙古史学史	137
第一章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蒙古史学史	137
第一节 十五世纪时蒙古人的历史编纂传统	137
第二节 封建佛教史学史的产生（十六世纪下半叶至 十七世纪初）	146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蒙古史学史	198

第一节	罗卜桑丹津的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 (《黄金史纲》)	199
第二节	《沙拉·图吉》(《大黄史》)	214
第三节	萨刚彻辰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	222
第四节	《阿萨拉格齐·耐日图一音·图克》 (《阿萨拉格齐史》)	245
注 释	255
引用书目	269
名词索引	294

引 言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作者计划编写的革命前蒙古史学史（从古代至1921年人民革命胜利）的前一部分。作者考虑到，要完成全部著作势必花费相当的时间，故决定将本书作为全部著作的第一部分交付出版。

从俄国学者奠定蒙古史科学基础至今，大约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见115；62；72；65〕。在这段时间内，各国蒙古学家在搜集、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近二十五年来，蒙古编年史或编成丛书刊布，或单行出版，这更加激发了研究家们对蒙古历史著作的兴趣。1952年，哈佛燕京大学（美国）所出的《蒙古学抄本（*Scripta mongolica*）》丛书问世。这套丛书以照像制版的方式刊布了罗卜桑丹津的《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纲》〔82〕，以蒙古人民共和国1937年首次发表的原本为兰本）、萨刚彻辰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的三种抄本〔83〕、拉西彭楚克的《宝罗·额利赫》（《水晶念珠》）〔84〕等编年史巨著。著名的蒙古学家们为刊布这批著作所写的引言十分有价值。其中，田清波为刊布萨刚彻辰《额尔德尼·脱卜赤》而撰写的《引言》，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论文。这篇文章对该编年史的各种版本不仅从版本学角度做了精辟的分析，而且从史学史角度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从1954年起，威斯巴登开始出刊一套以《哥廷根亚洲研究（*Co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为其总标题的专著丛书，从1959年起更名为《亚洲研究（*Asiatische Forschungen*）》。

这套丛书刊布了如下编年史：佚名氏《阿勒坦·脱卜赤》〔81〕，《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97〕，《察罕·图克》（《十善福经白史》），《成吉思汗史》或曰《少年宴》，《大黄史》——《沙拉·图吉》，佚名氏察哈尔史（最后两部编年史以附录形式发表在W·海西希的书〔241〕中），等等。

从1958年起，哥本哈根也开始出版一套名为《蒙古历史抄本（Die Mongolischen Historischen Handschriften）》的丛书。这套丛书由W·海西希编辑，是丹麦东方学家K·格伦贝赫创立的《Monumenta Linguarum Asiae Maioris》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套丛书刊布了不少蒙古编年史，如《额尔德尼·额利赫》（《宝贝念珠》）〔94〕。

196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历史学文献（Monument historica）》丛刊。该丛刊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这套丛刊已出版若干卷，刊布了一系列编年史和历史著作〔50〕。

此外，应当提到的还有主要是苏联、匈牙利和日本等国在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所做的工作。H·П·沙斯吉娜根据三种抄本整理出版了《沙拉·图吉》的集校本（附异读索引、俄语译文〔79〕和注释）。И·С·普奇科夫斯基出版了贡布扎布编年史《冈嘎一因·乌鲁斯哈尔》（《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史》，亦名《恒河之流》）〔63〕，书中附有人名索引和族名索引。1970年，H·Б·巴勒登扎波夫翻译出版了《阿勒坦·脱卜赤》，全书分三部分：研究部分，译文和注释部分，附录部分（抄本A的照像制版样，异读情况，引用书目，人名、族名、地名索引）〔58〕。H·П·沙斯吉娜译注出版十七世纪编年史杰作之一——罗卜桑丹津《阿勒坦·脱卜赤》〔80〕，也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匈牙利蒙古学家在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例证之一便是L·李盖提对《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所做的工作。他将这部史籍由旧蒙文译成了匈

牙利文，并用新的转写方法音译刊布了蒙文全文〔101〕。

日本学者服部四郎〔216〕、小林高四郎〔253〕、植村清二〔297〕、小泽重男〔269〕等人也对《纽寨·脱卜察安》、《阿勒坦·脱卜赤》进行了刊布和研究工作。

从版本学角度最先对蒙古史籍进行空前认真的综合性研究工作的，当推И·扎木察朗诺的名著《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158〕。该书真正奠定了科学分析蒙古史籍的基础。

蒙古人丰富的历史著作遗产引起了世界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依旧主要表现在对刊布的史籍进行描述和分类上，充其量也不过是从语文学和版本学角度作一番研究而已。至于真正从史学史方面进行探讨，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事，无论如何不会早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1953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发表了Л·С·普奇科夫斯基的论文《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封建时代史学史》〔194〕。该文是对蒙古历史著作从史学史角度进行概述的首次成功尝试。作者十分重视从现代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对蒙古历史著作进行研究。1959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了X·普日来的小册子《略论革命前的蒙古史学史》〔131〕，对蒙古人的史学知识的发展史进行了概述。W·海西希的著作《蒙古人的家谱与宗教史著作》〔242〕是蒙古史学史领域的重要著作。这部力作，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作者所研究的各部著作的内容，确定了各部编年史作者所引用的史料来源，介绍了各位史家的生平。但该书的第二部分，就学术内容而言，却远逊于第一部分，只刊布了十九世纪的四部蒙古编年史复制件。

1960年，本书作者曾写过一本题为《藏文蒙古史著》〔141；226〕。书中论述了蒙古人用藏文写成的蒙古史著作。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是从史学史角度对史籍巨著之一——达木丁的《金册》所进行的研究尝试〔142〕。196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报》

还发表过作者研究蒙古史学史遗产的论文〔120〕。

И·Я·兹拉特金为《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九卷)撰写的词条《蒙古史学史概述》对蒙古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贡献。该词条分析研究了蒙古人从古至今历史知识发展的各个基本阶段〔162, 第611页—617页〕。

以上所述,事实上就是世界蒙古学界近二百年来所有有关蒙古史学史著作的一个概况。从上述概括介绍中不难看出,蒙古史学史这块“处女地”远未得到“开垦”;大约正因为如此,在某些著作中也就偶而出现一些有关蒙古史学史的错误论点。比如, J·汤普森在其名著《史学史》中曾说过如下一段话:“直到事隔多年之后,蒙古人自己才开始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伟大业绩。唯一保存下来的用蒙文写成的蒙古史著作,乃是萨刚彻辰的著作。……其原本是1820年在西藏发现的(?!——沙·比拉注)。该书还从汉文史籍中摘录了若干内容作为补充。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知的有关蒙古人历史方面的全部知识了”〔292, 第354页〕。这一论点的谬误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学与非洲学学院大力研究亚洲各民族(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中国、日本、中东)的历史著作,并以《有关亚洲各民族的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为总题目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但是,在这套丛书中竟然没有为蒙古史学史提供一席之地(如果除去O·拉铁摩尔的短文《蒙古游牧社会史》不计的话;即使这篇文章也没有直接谈到史学史问题〔258, 第328页—343页〕)。

如此看来,可以大胆断言,除了少数蒙古学专家而外,蒙古史学史对于世界学术界依然是个未知数。后来,1960年斯德哥尔摩第十一届国际史学家大会方法与一般问题组在讨论英国历史学家M·巴特菲尔德的报告时,我曾指出,世界史学史不能仅仅局

限于西方史学史〔218, 第40页〕, 而应当包括内容丰富的东方史学史, 其中自然也有蒙古史学史在内〔218, 第40页〕。而后, 到下一届即第十二届国际史学家大会(维也纳, 1965年)时, 方法学与现代史组便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的题为《蒙古史学史》〔224, 第49页—56页〕的报告。这个报告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与会代表们的发言和报刊上的反响可以为证〔225, 第577页—586页〕。

本书作者研究的课题无论就年代范围来看, 抑或就材料范围来看, 都是很广的。探讨蒙古史学史的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新而杂, 且多半很少有人探讨过; 要彻底解决, 恐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在研究蒙古史学史过程中, 我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将它看做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历史知识发展过程的独立学科。

从这些原则出发, 我力图考察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史, 政治、哲学、宗教思想史, 并且历史地研究和阐明蒙古历史学家著述中的方法学问题。我的任务不仅在于确认某一现象, 而且在于用蒙古社会发展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封建主义史学史的阶级属性来解释这一现象。与此同时, 我还试图指出蒙古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区分出反映蒙古人全民族利益和社会需要的那些思想政治潮流。

我认为, 蒙古史学史可分为以下四个基本阶段:

(一) 古代和封建制度确立时期的历史知识(十四世纪末以前);

(二) 发达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割据阶段(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

(三) 满清统治下封建制度停滞和腐败阶段(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1921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本书只包括前两个阶段,即从古代至十七世纪末。

蒙古史学史之历史有其独自的特点。它产生于典型的游牧环境之中,发展与丰富了自古以来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若干世纪以来形成的史学史传统。

要解决蒙古人历史知识的起源问题,就不能置他们从原始蒙古人和蒙古境内突厥语族居民继承下来的种种传统而不顾。事实已经证明,游牧民族的历史知识成就也如同文化生活其他领域的成就一样,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世代相传,最终导致蒙古人文字史的产生和发展。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在神话和传说方面,在对待本民族起源于图腾祖先的看法方面,在以萨满教观点看待外部世界、看待历史、看待大汗政权方面,以及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方法方面,都有不少共同性的题材。“阔阔·腾格里”(青天)崇拜,无论在突厥语部族群的历史政治观中,无论在蒙古语部族群的历史政治观中,都占有中心位置。用十二生肖纪年来作为历史年代学的基础,是游牧民族最伟大的共同成就。

古代蒙古人关于大汗政权的历史政治观无疑是在起源于匈奴时代并延续了若干世纪的那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国家官职制度基本上是依古代先例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文史籍中用拓跋语记载下来的那些官职名称,与我们在《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特别是《察罕·图克》(《白史》)中见到的完全相符。

游牧民族的历史知识,综合起来可以称做“游牧史学史”。各个时代在蒙古境内居住过的所有部落和民族,都为创立这种“游牧史学史”作出过贡献。十三世纪蒙古人出现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是“游牧史学史”的最大成就和最圆满的结局。

蒙古史学史原本是在蒙古封建关系确立、统一国家建立的形

势下形成的。但是就其起源而言，蒙古史学史具有人民性，因为它产生的基础是民间口头创作。在这一方面，蒙古史学史上的处女作——《纽察·脱卜察安》是最明显的例证。《纽察·脱卜察安》的特点就在于它与蒙古人的口头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字产生以后，蒙古史学史便在征讨性战争和成吉思汗帝国建立的复杂条件下发展起来。尽管元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编修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工作，但是当时的历史著作流传下来的却为数不多。因此，我在分析这一时期的蒙古史学史时，不仅以传世甚少的历史文献为基础，而且还借助汉文史籍和波斯文史籍《元史》、《塔里黑—伊·扎罕古沙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扎米阿特—塔瓦里黑》（拉施特丁《史集》）等来复原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曾同三种发达的史学史传统即佛教史学史传统、汉族史学史传统、伊斯兰教史学史传统有过接触。但是这种情况对蒙古境内历史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帝国灭亡之后，蒙古人与汉人、波斯人在史学史方面的联系中断了。蒙古征服者运往异国或在异国编撰的一系列珍贵的古代蒙古史学史文献，也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永远湮灭在异民族文化之中。

蒙元倾覆（1368年）之后，蒙古史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继元朝灭亡而来的是封建割据和内讧之争，封建割据和内讧之争不免要在史学史上反映出来，因此即使在所谓“蒙古史之黑暗时期”亦即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蒙古历史编纂活动依然存在。我们知道，稍晚一些时候的蒙古编年史（特别是十七世纪的编年史）就含有不少采自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文字记载的史料，这说明蒙古的修史工作有着连续继承性。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某些汉文史籍和波斯文史籍还谈到，这一时期蒙古人的史学史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编修台吉——诸王、成吉思汗家族——的家谱。

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史学史活动明显地活跃起来：一方面，蒙古人同印藏宗教历史学派的联系密切了；另一方面，古代蒙古的历史政治传统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结果，一种新的封建佛教史学史的基础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最终形成，并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得到了广泛发展。

当时，尽管蒙古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但是蒙古史学史并没有变成满清中国官方史学史的附属品。相反，它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东方史学史的另一个分支——佛教史学史。

佛教也如同基督教那样，在它取得宗教统治权的国家和地区（锡兰、尼泊尔、中国、西藏、蒙古、布里亚特等）开始创立自己的史学史。因此，我想就起源于古代印度并在亚洲一系列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且在这些地区具有共性的佛教史学史作一番介绍。

对佛教徒来说，历史这一概念是与他们信奉的那种人世生活是虚幻而短暂的神学哲学教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历史现实和历史过程也象人生一样变幻莫测。从这种观点看问题，历史本身倘若不为道德说教和涅槃学说（人生的最终目的）服务，就毫无价值。换言之，历史应当成为佛教道德观的说教者和佛教神学论的吹鼓手。因此，著名的阿育王关于国王要遵守法规的许多训诫同后来藏王、蒙古汗关于法规的种种规定（宗教学说、王权学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了。

佛教史学史的共同点还表现在撰写历史有统一的模式，并表现在以宇宙起源论来阐述世界的起源、佛陀的生平、印度诸王等等。就此而言，锡兰的《摩河梵萨》（《大史》）、西藏的《迭卜帖儿·昂卜卜》（《青史》）、蒙古的《额尔德尼·脱卜赤》等编年史之间，差别不大。一谈历史，便都一致从传说中的佛教世界诸王之始祖摩河萨摩迪讲起。佛教徒诸王由此也便归于一源——源于该教的故地印度。

佛教的影响尽管很大，蒙古人的历史编纂活动却并没有盲目模仿佛教历史编纂活动。佛教的一支——喇嘛教虽然在蒙古广泛传播，但是喇嘛教在蒙古也遭到了当地的史学史传统的抵御。对于这种传统，佛教既然无法消除，因而也就无法象在西藏那样为宗教史学史的一统天下打通道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满清统治时期，蒙古人对本民族历史非但没有遗忘，反而更加关心，这简直可以说对异民族的统治是一种反抗。古代蒙古的历史传统，亦即所谓《纽察·脱卜察安》传统，正是在这一时期复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蒙古文字史正是在这种异民族压迫的情况下，才作为唤起人民怀念祖国历史的最重要因素而起到了作用。因此，罗卜桑丹津希望“伟大的人民继续读”他的史著〔52，第192页〕；《沙拉·图吉》佚名氏作者在其史著开头引用了如下一段格言：“凡人不知其来源，则如林中迷路的猴子；不知其宗族，则如碧玉雕成的假龙；不读其家谱，则如遭到遗弃的婴儿”〔79，第15页（俄译本），125页（原文本）〕，——所有这些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佛教传统与原本蒙古传统出现融合的基础上，蒙古史学史中新的观点形成了，一般历史以及蒙古历史的分期问题开始着手进行，蒙古人关于大汗和大汗政权的古老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上层人物的历史政治观也就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了。这种观点的基础一方面是蒙古人关于大汗政权的古老传统，另一方面是佛教关于“法规”的学说。这反映了“王位”与“教坛”结成亲密联盟的倾向。试举两个例证来说明这一问题。十六世纪末，俺答汗宣布喇嘛教为国教时，同时宣称自己是“法王”，达赖喇嘛三世是宗教首领。这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1911年至1919年封建神权君主制时期，博克多格根宣布自己为“统辖宗教与国家的共戴博克多汗”。也就是说，封建教权上层人物在试图以绝对佛教君主制的形式恢复蒙古国体时，所遵循的也是“两种原则”这一学说。